

# 穆罕默德·阿里对埃及部落 社会的治理及影响\*

冯 焱\*\*

**内容提要** 埃及部落是复杂的政治社会组织形式。部落成员之间的关系并非基于原始社会的平等，而是具有明显的等级制色彩。穆罕默德·阿里从三个方面治理埃及部落社会：一是规范方面，即与部落建立共同的认同情感；二是功利方面，即通过控制领地资源来监管和约束部落；三是强制方面，即通过惩罚措施来控制部落。他采取的积极有效的部落政策，微观层面起到了有效推动其改革政策的顺利实施，宏观层面对埃及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穆罕默德·阿里 埃及 部落社会 部落政策 贝都因人

部落 (Tribe) 是埃及乃至整个中东地区非常重要的社会单元与组织形式，至今仍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产生重要影响。国外学者已经对中东部落社会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埃及学者洛斯莱本的《中东的贝都因人》<sup>①</sup>对中东的游牧部落贝都因人的生活习惯、组织结构、社会关系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库利·菲利普 (Khoury Philips) 主编的《中东部落与国家的形成》<sup>②</sup>收集了一些欧美著名学者关于中东部落社会的研究成果，此书是相关研究题域的经典之作。法勒巴·阿卜杜·贾巴尔 (Faleh Abdul Jabar) 和胡

---

\* 本文系 2015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部落社会通史研究” (15ZDB062) 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科研经费资助。

\*\* 冯焱，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讲师。

① [埃及] 洛斯莱本：《中东的贝都因人》，刘阿钢译，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

② Philip S. Khoury and Joseph Kostiner eds., *Tribe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斯曼·达乌德 (Hosham Dawood) 在《部落与权力：中东的民族主义和种族》<sup>①</sup> 详细介绍了部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托马斯·J. 巴菲尔德则全面比较了中亚和中东部落的异同。<sup>②</sup> 鲁文·哈瑞尼 (Reuven Aharoni) 的《帕夏时期的贝都因人：1805 - 1848 年穆罕默德·阿里时期埃及的部落与国家》<sup>③</sup> 对穆罕默德·阿里时期埃及部落社会进行了论述。

目前国内学者有关穆罕默德·阿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改革与现代化方面。<sup>④</sup>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穆罕默德·阿里时期的埃及部落政策进行研究，即穆罕默德·阿里改革时期推行的部落政策，现代化过程中对传统部落社会的改造，以及部落政策对埃及社会发展的影响。

## 一 穆罕默德·阿里当政时期埃及的部落社会

部落社会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伊本·赫勒敦 (Ibn Khaldun) 认为部落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和过度崇尚自治并拥有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功能的社会组织形态。<sup>⑤</sup> 依据伊曼纽尔·马克斯 (Emanuel Max) 的理论，部落是一个包括多种类型和实体的大型社会组织，构成部落的每个氏族原则上拥有共同的祖先，但政治、经济和领地等非血缘因素也是部落形成中的重要因素。<sup>⑥</sup> 他认为大多数部落是某一族群出于牧场、水源和自卫的需要而与其他族群长期合作的产物。从政治经济层面上可以看出，部落是建立在对资源的合法利用和安全需要的基础之上。埃及沙漠广袤，艰苦的生态环境使部落在形成过程中受到牧场和水源等紧

① Faleh Abdul Jabar and Hosham Dawood, *Tribes and Power: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in the Middle East*, Saqi Books, 2003.

② [美] 托马斯·J. 巴菲尔德：《中亚视域下的部落与国家关系》，《中东问题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99 ~ 126 页。

③ Reuven Aharoni, *The Pasha's Bedouin, Tribes and State in the Egypt of Mehemet Ali, 1805 - 1848*, Routledge, 2007.

④ 刘娜：《穆罕默德·阿里启动埃及政治现代化进程分析》，《历史教学》2009 年第 12 期；王泰：《穆罕默德·阿里改革与埃及早期现代化》，《内蒙古师范学院》1997 年第 4 期。

⑤ Faleh A. Jabar, "Sheikhs and Ideologues: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ribes under Patrimonial Totalitarianism in Iraq, 1968 - 1998," in Faleh Abdul Jabar and Hosham Dawood, *Tribes and Power: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in the Middle East*, Saqi Books, 2003, p. 72.

⑥ Emanuel Max, "The Organization of Nomadic Groups in the Middle East," in M. Milson ed., *Society and Political in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1973, pp. 305 - 336.

缺资源的重要影响。另外,部落的规模大小和活动范围受到政府力量的影响和限制。总之,本文结合赫勒敦的血缘组织说与马克斯的混合模式说,认为部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社会组织。

埃及部落发展成一个复杂的政治社会组织,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并非原始社会基础上的平等,而是具有明显的等级制色彩。

菲利普·伯纳姆(Phillip Burnham)认为,部落社会的不平等主要是由空间移动造成的。<sup>①</sup>部落领地为部落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各种资源。这主要指其赖以生存的牧场和水源等自然资源,以及有可供控制的商贸通道等经济和战略资本。虽然原则上利用这些资源是全体部落成员共有的权利。但实际情况是一些强大的群落直接迁移到领地和周边地区,控制并霸占这些资源,利用比其他群落更多的资源。有时,他们甚至直接将一些弱小的群落从领地上驱赶出去,从而引发部落内部争夺资源的冲突。强大的部落通过蚕食和掠夺的方法乘机扩大领地。这种空间的变迁引发新一轮的迁徙浪潮,同时具有摧毁现存社会结构秩序之功效。这种依据实力进行的资源分配影响着部落社会的结构,导致政治集权和社会分层的出现。

部落社会需要首领以维持内部秩序并处理对外关系。具体表现为:对内主要是仲裁冲突、居间调停、分配资源和组织迁徙;对外主要是协助政府征税,为政府军提供装备补给和社会公共服务等。一般而言,部落首领的身份认同和领导地位的确立主要依据三大因素:代表居支配地位的族群,即代表部落的大多数人;拥有很高的个人威望和知名度;中央政府的认可。部落首领的产生过程通常比较混乱。马丁·凡·布瑞森(Martin van Bruinessen)认为,如果没有明确的制度规范首领的产生,那么部落内部常常有许多人争夺领导权。部落社会虽具有等级制,但并不具备集权社会的体制规范。这种制度上的缺陷助长了成员对领导权的争斗。但恰恰是内部的争权和外部的争斗有助于领导权最终形成。因为每次冲突都需要有魄力、有威望的人出面调停,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无形地增加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认可度。部落首领经常出面斡旋冲突,甚至以部落代言人的身份同政府进行交涉,从而部落首领在处置危机和冲突中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部落

<sup>①</sup> Phillip Burnham, *Pastoral Production and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349-360.

社会中的领导权地位。如在 18 世纪后半期，阿瓦拉多·哈比布（Awald Habib）担任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一些部落的首领，同奥斯曼帝国的殖民统治者和地方贝伊交涉来维护部落利益。<sup>①</sup>

埃及部落主要从事畜牧业和旱作农业两种类型的经营模式。养羊、养驼、养马、狩猎和劫掠是埃及部落的传统职业。<sup>②</sup> 从古代传承下来的畜牧业在埃及部落的经济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部落是市场上肉类和皮毛等产品的主要供给者。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对肉类的需求大增。为满足社会发展和人们的需求，阿里政府采取从欧洲引进种羊来改进埃及羊种的举措，并在政府部门中采取设立专职人员负责监管放牧活动的办法来发展畜牧业。

在沙漠广布的埃及，骆驼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在公共生活领域需要大量的骆驼来承担运输任务。阿里政府主要依靠贝都因人提供骆驼。埃及帕夏的军队也需要大量的骆驼，一旦发生对外战争时对骆驼的需求会更大。例如，在与苏丹的战争中，易卜拉欣帕夏从当地的阿喀巴布部落（al-kababish）征用了大量的骆驼。<sup>③</sup> 政府每年会给部落分摊任务，尤其在开掘马哈姆蒂亚运河时，骆驼起到了重要作用。<sup>④</sup> 部落还为商队、旅行者和朝觐者提供骆驼。政府要求东部的哈纳提部落首领每年向朝觐者提供驼队。1829 ~ 1830 年，该部落首领没遵从安排，结果遭到帕夏任命的库加·艾哈迈德（Kuja Ahmad）的武力征讨。<sup>⑤</sup> 部落有时将骆驼出售或租借给政府。商道上络绎不绝的驼队主要负责运输木材、羊毛、谷物和大米等战略物资。需求量的大增，导致贝都因人部落开始大量饲养骆驼，也刺激了从叙利亚向埃及的骆驼走私活动。

贝都因人很早就从事旱作农业，他们主要分布在上埃及和尼罗河流域的部分地区。随着阿拉伯人的入侵，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的贝都因人在东部省和三角洲地区获取了大量土地。来自北非马格里布的贝都因人主要集

① Reuven Aharoni, *The Pasha's Bedouin, Tribes and State in the Egypt of Mehemet Ali, 1805 - 1848*, Routledge, 2007, pp. 38 - 39.

② [美] 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新世纪出版社，2010，第 20 页。

③ Reuven Aharoni, *The Pasha's Bedouin*, p. 108.

④ Reuven Aharoni, *The Pasha's Bedouin*, p. 109.

⑤ Reuven Aharoni, *The Pasha's Bedouin*, p. 109.

中在上埃及的一些村落里从事农业生产。对贝都因人来说,早作农业是副业。他们灵活地采取多种经营方式。埃及部落的早作农业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

第一类是半游牧民的早作农业。半游牧民在西部土地上养殖牲畜的同时为满足自身的生活需求一直从事农业耕作。一些人开始定居生活后,更注重农业生产,但也没有完全放弃传统的养殖牲畜的生活方式。在半游牧部落社会,早作农业和畜牧业是并存的两种经济形态。早作农业的范围程度主要取决于可供利用土地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市场对作物的需求量。

第二类是游牧部落的农业活动。部落在领地内开垦小面积土地的现象很常见。只要季节平均降雨量达到 250 毫升,就能够在没有灌溉水源的地方种植大麦。但因为降水不规律和雨量偏少往往使产量非常少,这些农产品只满足于自用。

第三类是在国家分配土地上的农业生产。这种土地一般具有面积大、土质好、易灌溉等特点,因此适合长期定居耕作。耕种这种类型土地的贝都因人大多常年定居,但他们也没有完全放弃养殖牲畜。埃及政治的长期不稳定性和政策的不连续性,以及沉重的农业税负担,使得贝都因人更相信传统的养殖业。

在阿里时期,埃及政府通过一些工程建设将部落整合到现代农业发展的轨道上。政府在东部省的一些地区种植橄榄树和桑树林,发展丝绸业,并扩大到其他农业区;引进并推广棉花、烟草和水稻等新的农作物<sup>①</sup>;加强闲置土地的开发利用并扩大农作物的商品化。当然,阿里采取的鼓励开垦和定居农业政策措施,大大减少了可供放牧的区域。自由迁移放牧活动的受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

埃及部落经济不是严格意义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部落积极参与商贸活动,是整个国家经济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部落不仅从事放牧和种植活动,还积极从事商业活动和服务行业。欧洲的探险家在埃及发现,当地部落早已开始了农业活动,并将农产品进行交易。他们的主要产品有甘蔗、稻草和苜蓿等动物的饲料,几乎垄断了木炭的生产和销售。从 16 世纪后半

① 阿卜杜勒·阿齐兹·苏莱曼·努瓦德:《埃及近代史》,开罗,1985,第 56 页。转引自哈全安《中东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第 500 页。

期开始，贝都因人部落开始参与对外贸易，他们主要从事茶叶、面包干、香油、柠檬和镜子等商品贸易。<sup>①</sup>他们还贩卖地中海沿岸小湖的食盐，将其运送到开罗等地。此外，还为城市供给外部水源，用骆驼将西奈的水运送到城市，有时将水出售给途中的朝觐者。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贝都因人的经济影响力变得更为强大。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控制了埃及一些重要地区。红海线路对英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商路，但其中从苏伊士到开罗段由哈拜巴（Habaiba）部落占据。该部落的谢赫斯维林·伊本·哈比巴（Sweilim Ibn Habib）负责这里的安全事务，并向过往的船只征收保护费。哈瓦尔部落（Hawwara）在赛义德地区居于支配地位，同时还控制着这一地区的谷物贸易。19世纪，贝都因人开始参与更大范围的经济活动。拿破仑科学探险队的成员之一乔玛德（Jomard）曾指出：贝都因人种植烟草、靛蓝、甘蔗、椰枣、饲料、柠檬、谷物类和豆类产品，主要在当地的一些市场进行出售。<sup>②</sup>阿里在埃及建立现代工业。1830年，埃及的工厂开始加工棉花、丝绸、木材和亚麻布等。<sup>③</sup>阿里通过大量种植橄榄和引进美利奴绵羊来大力发展羊毛工业，贝都因人主要负责供应原材料和托运方面的事宜。

总之，部落经济在埃及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这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部落所在地具有战略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东部省是贝都因人部落最大的聚居区，同时是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重要商业通道和前往麦加朝圣的必经之路。二是中央政府在商品货物和手工制品上依赖于贝都因人的供给。三是部落主要从事畜牧业，在供应肉类毛皮产品方面处于支配地位。他们还为军队和商队提供战马和骆驼。这样部落经济活动和国民经济密不可分，成为整个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 二 穆罕默德·阿里对埃及部落社会的治理

穆罕默德·阿里针对部落社会的治理政策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规

① Reuven Aharoni, *The Pasha's Bedouin*, p. 102.

② Reuven Aharoni, *The Pasha's Bedouin*, p. 104.

③ [埃及]拉希德·阿里·巴拉维、[埃及]穆罕默德·哈姆查·乌列士：《近代埃及的经济发展》，枢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61~63页。

范方面,即国家与部落建立共同的认同情感。埃及社会由不同的群体构成。阿里认为,虽然不同群体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责任,但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不可分割。他动员部落为国家效力,为增强埃及的实力、地位而努力。二是功利方面,即通过控制领地资源来监管和约束部落。阿里通过给谢赫和部落贵族赐予土地和免税特权的方法,赢得他们的屈从和效忠,并借他们之手确保边境地带的安全和秩序。三是强制方面,即通过惩罚措施来控制部落。阿里为了相关政策有效执行,常将谢赫或他们的儿子作为人质。他经常干预部落之间和内部的争端,甚至强迫交出凶手并对之惩罚,以杜绝血亲复仇。

中央政府和部落的关系受冲突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这一矛盾源于部落社会的离心倾向和国家的集权趋势。阿里采取既打压又拉拢的政策来处理部落事务,通过强制政策平息部落内的战争,同时和部落首领结成联盟,将他们纳入地方管理体系。

### 第一,采取强制手段打压叛乱部落

上埃及的东部省(al-Sharqiyya)和布哈拉(al-Beheirah)等地是冲突的主要爆发区。经常性的动乱使当地治安持续恶化。大多数情况下,部落游离于农业区的边缘地带。因此,他们和定居农民的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但要在这一地区实现和平稳定就必须跟当地一些大的部落达成共识,比如霸占一方的哈纳提(Hanadi)和胡维塔特(Huwetat)等部落。当然也不能忽视部落在这一地区维护当地居民安全和保障商路畅通的作用,因此政府经常采取边谈判边打压的策略。

阿里掌权后意识到部落仍然对埃及社会的稳定构成重大威胁。主要是因为部落有能力毁坏农田和扰乱商品的运输。部落间相互袭击也引起了阿里的注意,因为这类冲突很容易演变为政治骚乱。阿里执政前,一些部落已经建立了各自的政治实体,并占据了一些战略资源。哈瓦尔部落控制着开罗到金字塔之间的通道,旅行者必须得到他们的保护或经得同意才可过。他们经常袭击开罗的郊区,引起当地居民的极大恐慌。<sup>①</sup>面对如此情形,阿里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控制哈瓦尔部落,并组织了多次针对该部落

<sup>①</sup> Reuven Aharoni, *The Pasha's Bedouin*, p. 166.

的军事行动。阿里还强迫谢赫居住在开罗及其附近地区，给他们发放薪酬，将其作为人质来确保部落顺从，以达到牵制和控制部落的目的。<sup>①</sup>

政府通常采用强制手段来打击部落的违法犯罪，但在具体的操作中非常谨慎。一般来说军事手段并不是第一选择。如 1837 年阿里任命其子易卜拉欣去处理一桩部落案件，再三确认该部落参与多起犯罪活动的情报准确无误后，才对其采取强制惩罚措施。1842 年，马扎部落抢劫了埃及去往英国的护航队，阿里责令该部落首领调查处理这一事件，反对政府使用武力来对付它们。当然阿里政府经常警告、逮捕一些失职或违法的部落首领。如朱迈阿特（Jume‘at）部落的首领乌玛尔·尹达瓦（Umar al-hindawi）被逮捕后遭到流放。阿维拉德部落的首领哈吉·吴赫德·阿布·阿拉维（Hajj Wuhedi Abu Alewa）曾被押送到开罗受审。<sup>②</sup>

第二，通过介入部落社会内部事务来施加影响，这是阿里控制部落的最基本策略

阿里政府涉足部落事务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参与任命部落首领。伊曼纽尔·马克斯指出，不管是部落直接推举还是经过选举产生的部落首领，最后都要经过政府的批准。阿里政府在选择候选人的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合适与否，并不一定看其家族是否强大。阿里也会接受部落内部推选的首领，后者主要负责解决部落内的个人恩怨和派系的争端。通过这一方式部落保存自身的相对独立和传统习俗，阿里也以这种“间接统治”加强了对部落的控制。

阿里通过发放薪酬的方式收买部落首领。薪酬的发放有好多种方式，其中主要以年金的形式。阿里大大提高了薪酬水平，并提供专项资金让部落首领保护前往麦加的朝觐者、运送货物的商队和负责其他一些地方公共服务。阿里执政早期就已开始给部落首领发放工资。1821~1822 年，阿维拉德部落的哈亚拉合首领就得到 5000 卡士（qirsh）的薪金。<sup>③</sup> 在这一时期，每位首领都能得到全额的薪金和酬劳，政府以此作为对首领服务和工作的肯定。这些报酬有多种名目：尹目（in‘m）主要是以授予大量土地以供首

① Reuven Aharoni, *The Pasha's Bedouin*, p. 166.

② K. Cuno, *The Pasha's Peasants-Land Society and Economy in Lower Egypt, 1740-1858*, p. 170.

③ Reuven Aharoni, *The Pasha's Bedouin*, p. 177.

领占有使用；卡斯瓦 (kiswa) 通常是对完成某些特殊任务后的赏赐；阿卢法 (Alufa) 是给牲畜提供草料，主要给那些饲养骆驼和马匹的部落首领，是对他们用自己的牲畜负责运送货物和军事物资的奖励。薪金的具体数额取决于部落所在地的实际情况。薪酬的多寡与部落首领管理的人口数量成正比。<sup>①</sup> 在法定节假日还有额外的补助。一旦部落首领根据实际需要向政府提出申请，政府还会相应提高他们的薪金标准。部落首领通过负责工程和给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来获取额外资助。但部落首领必须证明这些钱使用的合理性。大多数部落首领通过各种手段来骗取酬金，通常采取瞒报去世的人以增加人口规模的方式骗取酬金。

阿里政府一旦发现一些部落对公共秩序和社会安定构成威胁，就会将其分割成好几部分，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来瓦解部落的力量。由于实力相差悬殊，大多数部落接受政府权威对自己的操纵，但部落还继续在各自领地上同其他部落或当地农民争夺利益，继续在商道上充当盗匪到处抢劫，这些活动主要出于经济目的。

阿里将谢赫的儿子作为人质来惩罚、控制部落。<sup>②</sup> 对从事劫掠和袭击村民的部落采取严厉措施。最严厉的惩罚是将部落的羊群、骆驼和马匹等牲畜全部没收征用。以经济制裁的方式来切断其生活来源，达到牵制部落活动的目的。

阿里还利用部落间的争端从中渔利、分而治之，常常假借部落之手打败一些叛乱部落。1806 年 9 月，胡维塔特部落和阿耶德赫部落在开罗城外发生火并，两者截堵了多条主要干道。阿里随即支持胡维塔特部落，还“说服”布哈拉和法尤姆等省的部落加入政府的阵营。这对阿里树立威信、建立有效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还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控制居住着最有实力部落的东部省以及控制埃及西大门的布哈拉省等重要地区。阿里利用阿瓦拉多·阿里 (Awlad Ali) 和哈纳提 (Hanadi) 两大部落之间的争端，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达到了对整个下埃及地区的有效治理。

① Reuven Aharoni, *The Pasha's Bedouin*, p. 180.

② Ernest Gellner, "Tribalism and the State in the Middle East," in Philip S Khoury and Joseph Kostiner eds., *Tribe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109 - 112.

### 第三，通过设置专职官员来加强对部落社会的控制

阿里政府依靠奥斯曼—埃及精英阶层来维持统治。这些精英大致可以划分成五类：来自奥斯曼帝国的突厥人、在欧洲接受过教育的埃及西化分子、在地方拥有实权的土地贵族、亚美尼亚人、欧洲人。<sup>①</sup>

阿里任命专职官员纳齐尔（nazir）负责处理部落的日常事务。纳齐尔大多驻扎在部落民聚居的东部省、布哈拉和盖勒尤卜等省。他们对帕夏负责并终身任职。部落首领有时也会竞逐纳齐尔之位。

纳齐尔主要负责监管辖区的部落。例如，1836年纳齐尔巴希尔·阿加主要负责监控阿哈纳提等部落侵占东部省部落的领地和抢夺牲畜的行为。当然他们还承担其他职责，比如监管部落完成公共工程，为政府负责运输货物、农产品和动物产品。他们检查部落对所承担任务的完成情况，拥有对违法者强制执行和惩罚的权力。他们还负责收缴税款，处理那些逃避义务和税款的人。比如，贝都因人常常为了逃税会离开所在部落，这时纳齐尔主要负责将其遣返并强制让其履行义务、缴纳税款。<sup>②</sup> 纳齐尔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责是抓捕部落逃兵和逃犯。常常利用线人在部落内部收集一切有用情报，预防突发事件和骚乱，并惩罚部落的犯罪行为。纳齐尔在解决冲突中常常需要谢赫的参与和帮助。在布哈拉省的贝都因人部落中，纳齐尔邀请阿拉维德部落最有影响力的谢赫阿卜杜拉·马格瑞赫（Abdallah al-Magrahi）来帮助其解决多起争端。<sup>③</sup>

除了上述职责外，纳齐尔有时还有军事任务。例如，穆罕默德·阿加是政府部门的顾问，他在1848年成为布哈拉省贝都因人部落的纳齐尔，同时还拥有军事官衔。纳齐尔的军事任务是负责马匹和骆驼运输军用物资。纳齐尔也承担负责招募贝都因人服兵役。侯赛因·阿加（Huseyin Agha）是一名负责贝都因人部落事务的官员。他在1826~1827年担任布哈拉省的纳齐尔。他的主要活动包括：要求哈纳提和哈提马部落用各自的驼队负责将山里的木材运往政府所在地做柴火，安排向牲畜提供充足的草料等。他还

① E. Toledano, *State and Society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Egyp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1, 78.

② Reuven Aharoni, *The Pasha's Bedouin*, p. 169.

③ Reuven Aharoni, *The Pasha's Bedouin*, p. 170.

负责处理辖区内六大部落的行政事务。<sup>①</sup>

阿里政府通过任命纳齐尔作为管理部落事务的专职官员,一方面使得政府的政策能够有效地贯彻实施,扭转以前处理部落事务的随意性和混乱局面,改变地方官员相互推诿扯皮、行政效率低下的状况;另一方面,充分说明部落在埃及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使得政府不得不对其重视,并将管理机构常态化和法制化。

#### 第四,采取有效措施加速推进部落的定居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在客观经济环境变迁的压力和政治因素的干预下,部落社会一般趋向于定居生活。依据加布里埃尔·贝尔(Gabriel Baer)的观点,部落的定居过程主要有三种类型:游牧部落弃牧从农、当地居民的同化、政府的去部落化政策。在埃及社会中部落定居化有以下两种方式。

一是部落民与毗邻的农民在相互交往中渐渐淡化了部落认同。部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存着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习惯法,但基本上被当地农民同化,最后走上定居化道路。

贝都因部落人口一般分为定居和游牧两种类型。伊本·赫勒敦根据社会分层将贝都因人分成三个级别,处于最高层的是居住在绿洲或接近水源地的部落。还有些学者将其划分成四类:饲养骆驼的边远游牧民;饲养羊的邻近游牧民;季节性迁徙游牧民;定居的贝都因人。<sup>②</sup>马木鲁克时期,部分贝都因人变成农民。奥斯曼帝国占领时期,大多数贝都因人开始成为农民。18世纪中期,贝都因人加快了定居化的速度。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由北非迁徙到埃及的部落从当地居民手里购买土地并开始耕种。例如,来自北非的巴格哈提(Baraghith)部落从当地人手里购买大量的土地。根据穆瑞(M. W. Murray)的描述<sup>③</sup>,被哈瓦瑞部落驱逐的阿维纳(Bani Awna)部落和定居农民(fellahin)生活在一起并最后被后者完全同化。18世纪后期,像阿维拉德等部落虽然规律性地在东部绿洲和尼罗河流域来回迁徙,但已经开始接受农业技术并从农民那里租借土地。居住在亚历山大和拉希德附近的贝都因人大多具有半游牧半定居的属性,它们和当地的居民经常

① Reuven Aharoni, *The Pasha's Bedouin*, p. 172.

② Reuven Aharoni, *The Pasha's Bedouin*, p. 83.

③ Reuven Aharoni, *The Pasha's Bedouin*, p. 83.

通婚。对 18 世纪末到访埃及的西方探险家来说，最深刻的印象是当地贝都因人的定居化进程，这从他们的著作中可见一斑。18 世纪六七十年代，多次前往埃及的英国旅行家詹姆斯·布鲁斯直接将部落民描述成阿拉伯农民。还有欧洲的一些探险家在埃及发现当地的部落和农民极其相似。在 19 世纪中期旅行家约翰·拜勒走访上埃及，在这里并没有看到大规模的游牧贝都因人的存在，仅仅是一些保留了原来习俗的定居贝都因人。虽然它们仍旧归属于邻近地区的部落组织，但他们已经成为拥有土地的农民了。<sup>①</sup> 贝尔认为贝都因人定居后从事农业生产，日常生活中逐渐被当地的农民同化。

二是阿里采取有效措施转变部落首领角色推行部落的定居化。阿里采取软硬兼施的政策加强对部落的控制，一方面将部落首领纳入政府管理机构，并将他们安置到城市和农村长期定居，让他们远离部落实体；另一方面为了确保政令的畅通和有效执行，将部落首领和其亲属作为人质扣押。1833 年以前大多数政府职位由非埃及人掌控，自此以后部落首领大量开始在埃及的政府部门中任职。<sup>②</sup> 这样的直接结果是他们被整合进官僚系统，大多数部落首领不得不远离家乡赴城市任职。比如阿巴扎部落的大多数人去东部省的一些城市和其他省份定居。阿里还将一些人带到开罗去做人质，卡奥特贝伊（Colt Bey）有这样一段话：在和平时期，阿里要求一些部落首领居住在开罗，将其作为人质。

阿里通过给部落首领分配闲置和未开发的土地的方式加速部落的定居。1826 年开始第一批土地的分配，这些土地大多数恩赐给了部落首领。昔日的首领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拥有大地产的地主。同时，转型后的部落首领开始雇佣部落民在属地上进行耕作，间接地将游牧民转变成了农民。阿里政府为了鼓励开发土地，增加土地的利用率，土地税一般采取前三年免除的征收政策。<sup>③</sup>

## 第五，招募部落民参军以壮大远征军力量

穆罕默德·阿里为巩固统治地位，对外协调埃及与欧洲列强的关系，

① J. J. Hobbs, *Bedouin Life in the Egyptian Wildernes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9, pp. 12 - 21.

② Gabriel Baer, *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Chicago, 1969, p. 5.

③ G. Baer, *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p. 7.

抵御奥斯曼帝国的威胁；对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打击各种反对势力。但是外部持续的压力和改革中不断涌现的社会矛盾使他将重点转移到军事扩张，以便转移国内矛盾。<sup>①</sup> 1810~1841 年，阿里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占领埃及周边的大片土地。部落参与了这些对外征伐，并对战事的顺利进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阿里对部落力量的倚重从远征军中的部落民人数中可见一斑。

1811 年 8 月 8 日图苏帕夏（阿里的儿子）率领的远征军开始向汉志进发。这支队伍中有 3000 人的骑兵团，他们大多由贝都因人组成。法瓦亚德、哈瑞比和阿维拉德部落都参加了图苏的远征军。1816 年 11 月 5 日，易卜拉欣帕夏发动了第二次对汉志的战争。这次行动中阿巴达部落是最主要的支持者，提供了近 6000 匹骆驼向库赛运送兵力，这样埃及军队可以很快跨海到达延布。<sup>②</sup>

苏丹战争中也有大批贝都因人参与其中。阿里主要依靠阿布巴德部落提供的骑兵，因为该部落长期在这一带从事商业贩运，对当地的路线和抵达苏丹的要道了如指掌，军队中阿布巴德部落的骑兵人数甚至一度达到 900 人。

叙利亚地区涉及埃及的特殊利益，因此阿里多次卷入该地区的内部争端。统治初期，他最为关切的是运输通道的安全和“叙利亚商道”的畅通。这条道路从西奈半岛的北部一直通往阿里什和加沙地区。1828 年，他率领埃及东部省哈纳提部落保卫通往阿里什的商道。他的儿子易卜拉欣集中主要力量保护加沙地区，贝都因人主要负责给他运送设备和生活补给。1829 年，易卜拉欣从祖赫纳、阿曼耶姆和祖曼阿特部落调集了 300 头骆驼专门负责给加沙的埃军运送装备和食物。<sup>③</sup>

### 三 穆罕默德·阿里的部落政策对埃及社会发展的影响

阿里为了树立权威，确保在埃及的有效统治，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采取积极有效的部落政策，有效推动了改革的

① 顾琦斌：《穆罕默德·阿里时期对外扩张探析》，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② Reuven Aharoni, *The Pasha's Bedouin*, p. 196.

③ Reuven Aharoni, *The Pasha's Bedouin*, p. 202.

顺利实施，对埃及社会发展和国家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

### 第一，有效抑制了部落间血亲复仇，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由于艰苦的自然条件和人口数量的增加，以及游牧部落季节性迁徙对空间纵深的需要，客观上部落比农民需要数量更多和范围更广的领地。领地在部落的日常经济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比如马扎部落在埃及东部的沙漠地区给自己划定了界线，并一直精心守护。

部落经常因保卫生存领地，或入侵其他部落的领地而争斗不休。这是部落的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主要劫掠骆驼等畜群和其他一些家用财产。比如，同属瓦勒部落的台格力卜族和伯克尔族，仅仅因为台格力卜族的酋长伤害了伯克尔族一位老妇的母驼，两者之间的复仇战争竟然前后持续了40年，几乎同归于尽。<sup>①</sup>这种袭击往往带有血亲复仇的文化印迹，更重要的是具有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动机。但这在空间有限、资源短缺的领地上保证了畜群、牧场和人口的生态平衡，从而起到一种调节作用。

部落间的谋杀和仇杀是很常见的。这是部落内部和部落之间为争夺经济资源、获取有利生存资本的一种方式。阿里采取有效手段来阻止这种血亲复仇式的争端发生，政府通过逮捕惩治凶手平息事端，防止凶手被其他部落包庇而引起部落间更大的复仇行动。对那些拒绝交出凶手的谢赫，政府常常以威慑手段惩罚它们。比如，阿维拉德部落的谢赫阿卜杜·哈里姆·拉赫拉和（Abd al-Halim Lahlah）和他的兄长阿维德谢赫被谋杀后，政府立即派人去达兰处置这一事件。凶手属于阿卜杜拉赫部落，阿里派穆罕默德贝伊去逮捕凶手时要求阿卜杜拉赫部落的谢赫伊萨·伊本·塔里夫（Isa Ibn Tarif）提供方便。<sup>②</sup>埃及历史学家穆罕默德·福阿达·舒克里（Muhammad fu 'ad shukri）指出：它们（部落）被迫接受阿里的统治权威，部落谢赫也非常清楚，得到政府认可的最好方式就是交出政府通缉的犯罪分子。<sup>③</sup>阿里政府为了杜绝部落间基于领土而引发的冲突争端，采取了禁止部落在不同省份间自由迁徙的限制措施，并通过官方的形式正式承认了部落

①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阿拉伯人的日子》，冯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42～168页。

② Reuven Aharoni, *The Pasha's Bedouin*, p. 165.

③ Reuven Aharoni, *The Pasha's Bedouin*, p. 164.

的固有领地界线。

## 第二，阿里的经济政策对部落社会生活方式转变的影响

农业是埃及的经济基础，阿里为了有效地维护统治，采取多种土地所有制增加政府财政来源。为了达到增加税源、发展经济的目的，阿里政府主要推行三大政策措施：通过大规模开垦闲置土地增加全国可耕地面积；疏浚从尼罗河支流到亚历山大港的马赫迪运河，增加可灌溉土地的面积；修筑靠近亚历山大港的堤坝。在东部省某些地方大规模种植桑树，发展养蚕业。1815 年底，阿里通过国有化方式从地主手里收回大量土地。在收回土地权后，阿里政府重新分配土地，通常将可耕地、未开垦地和闲置地分配给亲信、家族、部落首领，进而孕育拥有更多地产的新兴地主阶层。<sup>①</sup> 阿里政府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大力修建灌溉设施，打破了作物生长时间和种类的限制。为了增加国家税收来源，他积极开发农业土地，从 1826 年起着手开发分布在贝都因人部落领地上的闲置土地。

阿里为组建新军和发动战争开始建立新式工厂。他在埃及建立了兵工厂、造船厂和火药厂，发展军事工业，兴办纺织、制糖等近代工业，监督私人手工业，1830 年，埃及的工厂已经开始生产加工棉花、丝绸、木材和亚麻布等。<sup>②</sup> 阿里通过大量种植橄榄和引进美利奴绵羊，大力发展羊毛工业。<sup>③</sup> 他采取行政保护措施，一方面要求各部门尽可能使用本国生产的工业品，减少进口；另一方面，通过免税手段鼓励埃及产品出口，还将农产品和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固定。<sup>④</sup> 贝都因人主要负责供应原材料和托运方面的事宜。

畜牧业和旱作农业是部落的主要经济形态，对部落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有着重要作用。阿里在农业、工业和高贸领域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导致部落内部发生巨大变化。部落领地内原本的自然状况和实际的经济活

① 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第 181 页。

② [埃及] 拉希德·阿里·巴拉维、[埃及] 穆罕默德·哈姆查·乌列士：《近代埃及的经济发展》，第 61～63 页。

③ K. Cuno, *The Pasha's Peasants-Land Society and Economy in Lower Egypt, 1740 - 185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59.

④ K. Cuno, *The Pasha's Peasants-Land Society and Economy in Lower Egypt, 1740 - 1858*, p. 259.

动的平衡被人为打破，从而带来部落内部经济结构的变革。阿里的土地政策刺激了贝都因人从事农业活动。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保证了农村贵族获得更多的土地。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贝都因人弃牧从农，成为部落首领的雇工。阿里时期西部沙漠地带的大多数部落迁移到尼罗河流域和一些绿洲区，并开始定居农耕生活。阿里政府鼓励在游牧区从事农业生产：一方面通过限制部落的自由迁徙，以控制部落的放牧区域；另一方面通过优惠政策鼓励部落改变生活方式和经济模式。这导致部落民和当地农民在社会和经济上的趋同，从而使两者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但同时相互间的冲突变得更加频繁。最常见的是让部落负责修筑灌溉堤坝、开挖运河和负责运输等公共事务。由于工作性质的转变和收入来源的稳定可靠，部落开始了永久的定居，这改变了部落原有的经济生活方式和居住模式。当然部落民也并没有忘却部落传统的血缘背景，因为这一纽带可以在危急时刻继续给他们提供经济保障和人身安全。<sup>①</sup>

### 第三，部落力量在阿里的对外战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类学家亨利·罗森菲尔德（Henry Rosenfeld）认为，部落社会天生具有优越的军事能力。在他的研究中论证了巴尼·海拉勒（Bani Hilal）部落对北非的入侵。认为埃及大多数游牧部落的军事潜能要比农民的强很多，它们在逃避中央政府的军事打击、劫掠过往的商旅车队、袭击农庄方面能力更胜一筹。<sup>②</sup> 马木鲁克王朝后期，贝都因人的军事力量得到政府器重，他们在军事领域非常活跃。到奥斯曼帝国时期，贝都因人成为当地贝伊的得力助手，被用来镇压埃及当地居民的叛乱活动。部落力量的坐大和外国的武力入侵，导致中央政府的孱弱和部落分离倾向加剧。这一现象在18世纪极为明显：赛义德的哈瓦瑞部落获得了很大的自治权，哈拜巴部落希望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取得绝对的优势地位。1711~1769年，哈拜巴部落的首领哈比巴谢赫和他的两个儿子萨利姆、维利姆一直控制尼罗河三角洲地区。他们通过和其他部落结成联盟，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哈比巴谢赫击败了

① Richard Tapper, "Anthropologists, Historians, and Tribespeople on Tribe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n Philip S Khoury and Joseph Kostiner eds., *Tribe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pp. 49 - 53.

② Michael Winter, *Egyptian Society Under Ottoman Rule 1517 - 1798*, Routledge, 1992, p. 95.

开罗的统治者哈桑·阿卜杜·达法阿，并缴获了大量的加农炮。维里姆组建了一支主要由黑人奴隶组成的骑兵团，萨利姆建立了控制尼罗河水域的水军力量。

阿里执政时期着手解除部落军事武装的同时，又通过招募部落民参军的方式来壮大政府军的力量。政府通过给部落首领和骑兵发放工资、奖赏等收买和招募部落民兵。货币是最主要也最具有吸引力的收买方式。部落首领在收到金钱和捐赠后就会马上指派自己的部落民去报名。每位骑兵月工资是 200 ~ 500 卡士 (qirsh)。<sup>①</sup> 这些骑兵参加战争时工资会相应提高。贝都因人的骆驼是阿里创建新军的基础之一，有这些驼队作后盾，军队的后方补给线就没有后顾之忧。这使阿里可以扩大军队的数量规模，能够尽可能在边远地区部署部队，并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在汉志、苏丹和叙利亚等地进行远距离的作战。<sup>②</sup> 政府购买大量骆驼一方面用来当作作战工具来骑用，另一方面作为运送装备和战略物资的运输工具。来自法瓦耶、哈瑞比和哈纳提部落的贝都因人主要负责给军营运送装备，以及面粉、木材等后勤补给。政府有时向部落征用骆驼，还设立专门官员负责租借骆驼并检查是否可用于军事。

在组建新军后，阿里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它们分别是：第一次为打击汉志和阿拉伯半岛其他地区瓦哈比运动，进而达到消灭沙特家族并控制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圣城的目的<sup>③</sup>，埃及于 1811 年发动了汉志战争；第二次为控制整个尼罗河流域，并占有苏丹地区的黄金资源，进而扩大埃及与非洲大陆的贸易往来，最后达到一举铲除盘踞在苏丹的马木鲁克残余势力的目的，1819 年在军事顾问拉朱赫里的建议下出兵苏丹；第三次为了确保从西奈半岛北部一直通往阿里什和加沙地带的“叙利亚商道”的安全畅通，从 1820 年起开始组建强大的军队入侵叙利亚。数次对外战争在扩疆拓土、扩大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每次战争部落力量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① Kh. Fahmy, *All the Pasha's Men: Mehemed Ali, His Arm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86.

② 参见刘渊、王新刚《19 世纪 30 年代埃及在叙利亚地区的统治研究》，《中东问题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163 ~ 190 页。

③ 哈全安：《中东史》，第 495 页。

这些战争大多在沙漠地区进行，而阿里非常欣赏贝都因人在沙漠的行军和战斗能力。他也需要部落在当地的的社会关系网。阿里借助部落力量可以与被征服地的部落建立关系，并“说服”后者服从埃及政府。这在汉志地区的部落中很常见，苏丹和叙利亚地区的一些部落也因此主动加入埃及一边。即便占领了相关地区，阿里还是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比如当地部落的起义随时都可能爆发，当地驻军的食物来源需要当地居民提供等。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贝都因人，因为他们有能力挑起事端也有能力平息不满。阿里还需要部落的驼队运送军队装备和后勤物资。只有通过部落，才可以扩大军队的规模并在边远地区部署部队，从而具备足够的能力在汉志、苏丹和叙利亚等地进行远距离作战。

由此看见，阿里政府看重的是部落英勇善战的自然秉性，倚重它们在恶劣的沙漠环境中行军和作战的能力，将它们视作国家军队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而部落的骆驼既是政府军队的保障之源，也是强大的埃及军队南征北战的有力支撑。

总之，部落是埃及社会重要的组织形态和社会单位。穆罕默德·阿里认识到埃及部落在稳定社会秩序、有效推行改革和对外征战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针对埃及部落采取了在政治上打压和拉拢，经济上利用和军事上倚重的政策。阿里对内通过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规模宏大的改革，一改埃及部落的离心倾向并将其整合到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轨道上，使埃及成为可与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列强相抗衡的国家。对外通过常年征伐和扩疆拓土，一改埃及自古以来是各大帝国相互争斗目标的境遇，建立了一度称霸近东的帝国。阿里缔造了统一的近代埃及民族国家，而埃及部落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在推动埃及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责任编辑：闫伟]